

“一带一路”战略合作**“伊斯兰全球化”对中国未来的影响**

罗伯特·R.比安奇

摘要: 伊斯兰全球化是与宗教、经济、政治和外交等领域的各项发展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上述领域的形势发展正在改变着伊斯兰世界。伊斯兰全球化包括这样一些组成部分:朝觐与宗教旅行,资本主义与伊斯兰金融,民主与伊斯兰现代主义,以及按照多种多样的文化环境里的穆斯林的各不相同的需求与偏好而逐渐建立的新的国际机制。伊斯兰全球化允许现代穆斯林加入国际社会生活的主流,并同时对社会加以改革。其实,这些也正是中国的目标。特别是,中国领导人对软实力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而且热切地认同关于文明间对话和全球治理的远见卓识,因而伊斯兰全球化的目标也可视作是中国的目标。

关键词: 伊斯兰全球化;伊斯兰金融;伊斯兰现代主义

作者简介: 罗伯特 R. 比安奇(Robert R. Bianchi),博士,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

译者简介: 忻华,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政治学博士后(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5)05-0022-14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伊斯兰全球化是一个理念。我开篇就这么说,是因为我不希望任何人对其产生误解。我觉得,伊斯兰全球化与其说是一个事实,不如说是一个美好的设想,这样说也许更合适,但是伊斯兰全球化绝不是一个概念或模式,与范式或议程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每一个人都“知道”穆斯林并没有全球化,因为全球化意味着变成西方的样子,意味着世俗化,接受无神论,变得不可靠。所以,穆斯林不仅没有全球化,而且变成了拒绝主义者,他们按照自身独有的方式生活,尽可能使他们相互之间、乃至使其他人伊斯兰化,受到伊斯兰力量的影响和改造。

伊斯兰全球化是一项带着特定意图的工具,能够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包括社会学的、人文主义的、科学的和精神上的想象力。换言之,拥有想象力,就意

意味着我们能够将眼睛睁得更大一些,能够欢迎那些意外的惊奇的想法,而这些想法会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经验,并最终重新塑造我们的世界。

我没法知道在伊斯兰全球化的过程中会发生哪些事情。虽然在过去数年里,我逐渐了解到了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真实生活的各种情形,但我并不知道这些情形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也不知道伊斯兰全球化这个理念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也许伊斯兰全球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这一理念有其自身的生命周期。不仅那些将这一理念召唤出来的作家们无法控制这一生命周期,而且任何大国或任何想要垄断真理或财富的行为体,即使试图扼杀这一理念的相关活动,或为其自私的目的试图对其加以利用,也仍然无法控制这一生命周期。

伊斯兰全球化,我希望你一切都好,能够长久生存,并且越来越繁荣!

那么,到底有哪些系列性的发现促使我,或者说迫使我在现有数据之外,去寻找更广泛的趋势和更深刻的意义?在当前关于世界政治的讨论中,包括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不断提升的重要性的讨论中,有哪些深刻的见解能够为这些讨论作出贡献呢?

为了能让读者真实地理解我所走过的令人迷惑的路径,最好的办法是从中间开始讲述,而不是从开头或结尾开始讲述,是先讲述我在中间那些年里研究和体验穆斯林前往麦加朝圣的哈吉旅行的感受,而不是先讲述我在更早些时候对社团生活和利益集团政治的研究,或者我当前对中国与美国外交的探索。

一、朝觐与宗教旅行

哈吉(阿拉伯文原意为“朝觐、朝圣、朝觐者称号”等)是伊斯兰的核心与灵魂。哈吉体现了穆斯林最为珍惜的一个理想,并使这个理想成为永恒的追求,那就是:全体人类形成一个普世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真主对芸芸众生平等待之,只根据每个人的行为与良心对其作出评判,而忽略每个人在种族、民族、阶级、年龄、教派、党派、家庭、族群、语言与地位等方面各不相同的归属。^①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然而,正因如此,这个梦想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变得更加强烈,显示出更大的吸引力,并传播到更广阔的范围,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不公正和不平

^① 罗伯特·R.比安奇:《真主的客人:伊斯兰世界里的朝圣与政治》,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等,显得愈加势不可挡和令人难以忍受。^①

然而,在实践中,哈吉能够发挥的团结信众的作用,与其发挥的分化信众的作用,是一样大的;哈吉一方面将社会各阶层置于平等的地位上,另一方面则在推行等级制。这是因为哈吉与伊斯兰自身一样古老,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在过去 14 个世纪里,哈吉每年都在不断产生着自相矛盾的趋势。现在哈吉的规模已经非常庞大,动员和影响着来自于世界各国的总共 150 万朝觐信众。这就需要国际社会各类行为体每年都施以援手,开展协作,这些行为体包括:国际组织,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政府,各类公司,投资基金,各类社团,各类政治家,布道者,工程师,电讯专家,安全部队,医疗卫生领域的专业人士,记者,扩大了的家庭,以及数不清的其他各类行为体。

由于哈吉已经深深融入现代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和每一项制度,因而哈吉会不可避免地反映和强化既有的权力与财富结构,但哈吉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哈吉象征性的和精神上的精髓,却在持续不断地挑战和批判这些权力与财富结构。难怪对哈吉的管理成了人们能够想得到的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没人能够一方面满足如洪水般涌来的物质需求与个人需求,另一方面同时对朝觐者希望将今生的自己与来世联系起来的超验性体验保持忠诚。

大多数穆斯林希望他们的统治者能够支持哈吉,为哈吉提供便利,因为他们觉得统治者有责任帮助尽可能多的信众来实现伊斯兰最神圣的宗教义务。他们实际上也是这样要求他们的统治者的。一些穆斯林情愿与统治者进行交换,以选票和忠诚交换朝觐麦加天房的机会,但多数信众拒绝这样的互换,因为他们相信,真主要求所有的政府向朝觐者提供帮助,信众并不欠政府什么,政府不应要求回报。结果,对于为哈吉提供运作和管理上的支持的领导人和官员,很少有人公开表示赞扬,但人们总是持续不断地对这些管理和运作中出现的低效、偏袒、腐败和私相授受的情形给予严厉的批评。

伊斯兰教总是严肃地要求穆斯林们开展哈吉旅行,但纵观历史,哈吉旅行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因为大多数信众缺少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实际手段来开展这一代价高昂、充满艰难险阻的旅行。然而,自二战结束以来,哈吉已经发展成为一场群众性的宗教旅游的运动,而且世界上每个大洲之间相互连接的各种网络,都在支持这场运动。我在考察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哈吉活动时,意识到哈吉活动在仅仅数十年间,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不仅哈吉旅行的规模非常庞大,可谓史无前例,而且有史以来第一次,朝觐者的国家与地理分布,能够相当精确地反映出世界的整体情形。现在,大多数的朝觐者不是来自于阿

^① 马歇尔·G.S.霍吉森(Hodgson, Marshall G.S.):《伊斯兰的探险:一个世界文明之中的良心与历史》,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74 年版。

拉伯国家,而是来自于东南亚、南亚、非洲、欧洲和美洲等地的非常遥远的国家。目前朝觐者数量最多的热点国家,有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伊朗、土耳其、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南非。朝觐者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有德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也有中国和美国。麦加仍然是伊斯兰世界象征性的中心,但那些过去被视作边缘性和外围性的国家,在现代化方面,几乎都已超越了沙特及其邻国。

同样重要的是,我很快就了解到,哈吉现在已经不再是男人、老人、有钱人和城里人所独享的权利,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妇女在过去这些年里已逐渐成为朝觐的主力。朝觐者的平均年龄每年都在下降,而且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人占据的比例越来越高。由于政府补贴和一揽子旅行方案降低了旅行和住宿的价格,所以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人士可以在特定的银行账户里存钱,为举家朝觐作准备。绿色革命和城市化所带来的迁徙,使最偏远的村庄里有可能成为朝觐者的人,能够借助地方性的市场和全国范围的信息网络将彼此联系起来。同时,由于民主选举制度的扩展,和草根社会政党组织的发展,现在政府为哈吉提供的服务已成为庇护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服务与政府修建更好的道路和提供更便宜的电力的服务在性质上是具有可比性的。

我还发现,对哈吉的管理,已经成为一项得到充分发展的国际机制。这项机制反映出,以沙特的主权受到削弱为代价,亚洲和非洲的非阿拉伯国家之间建立起明确的权力分享协议。我在探索这项国际机制的法律基础时,深感惊讶;这项国际机制在各种相互竞争的利益群体之间建立起来的精巧的平衡,及其对自身合法性的解释,令我惊叹。实际上,这项国际机制是一种妥协,这种妥协承认,相互冲突的各种需求应该得到某种平衡,这些相互冲突的需求包括:国家主权、所有朝觐者的旅行自由、为后代保存人类共同遗产的需要等。

新的哈吉机制的运作模式,与此前包含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中的精巧的妥协模式非常相似,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开放性条款,如关于专属经济区、深海采矿权和海洋法庭的条款,与新的哈吉机制很相似。现在中国和美国对于在西太平洋的有争议的水域如何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问题,各自采取了相反的立场,这就像伊朗和沙特为了解读和执行有关哈吉的国际机制而展开争吵一样。

使世界各地的普通穆斯林能够接触到哈吉的那些力量,恰好就是使世界各地的现代社会生活得到改造的那些力量。这些力量包括:科技革命,迅速推进的工业化和不断扩展的国际贸易,中产阶级消费市场的大爆炸,去殖民化和自治的发展,民主选举与群众性政党组织,志愿性社团和社会运动的扩大,从乡村向城市的移民和大城市带的出现,高等教育的拓展和更加年轻化的人口,得到强化的职业女性的权力,更长的预期寿命和退休收益,非西方经济与文明的令

人惊讶的迅猛增长,国际机制和政府间组织的扩散,在世界外交舞台上争夺影响力的地区性强国的多样化,等等。

换言之,哈吉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例子,展现出正在不断发展的全球化,而这样的全球化包含了当今跨国的社会与政治体的所有成就与困境。但是伊斯兰世界的全球化并非过去既有的全球化的翻版,哈吉仍然是规模巨大的因宗教而激发的力量。哈吉受到很多相互交叉的宗教与世俗进程与冲突的推动,同时又重塑了这些进程。这些先验的和世俗的追求的持久的相互作用,已扩散到穆斯林的社会变迁的所有方面,因而在他们的经验的基调里,普世的色彩与独特的因素并存。正因为如此,伊斯兰世界的变化与其说是一个反潮流的运动,或一个单独的发展路径,不如说是更加总体的趋势所衍化出的一个伊斯兰变体。

除了哈吉与宗教旅行,我还将指出伊斯兰全球化的另外三项因素:资本主义与伊斯兰金融、民主与伊斯兰现代主义和外交与大国政治。现在,人们正在使用宗教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外交的建筑材料来建造伊斯兰世界,这是一个由各种活跃的和富有创造力的社会构成的跨越各大洲的网络,这个网络不仅会使研究伊斯兰世界和国际关系的学者的许多基本的假定与期待被搅乱,而且也会使国家的和商业的权力堡垒受到震撼。

二、资本主义与伊斯兰金融

企业家和不断扩展的市场在所有的时期和文化环境中都对伊斯兰的诞生和传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其中,企业家和市场体系通过远距离贸易、商业借贷和大规模生产所发挥的作用尤其重要。人们通常将伊斯兰社会描述成一个国际性的网络,这个网络包括城市、集市、行会和港口,在这些地方,流动的商人与苏菲派教士、学者、工匠和士兵混合在一起。伊斯兰文明能够将各种国际通用语言和地方性语言混合在一起,还能够在亚洲和西方之间持续不断地传递彼此的知识 and 创新,并以此闻名。

很明显,穆斯林为世界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始终有不少人在争论伊斯兰是否能与现代资本主义相兼容,这是挺奇怪的事。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已经普及了三个观点,这三个观点彼此间存在最尖锐的分歧,这三个观点是:伊斯兰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障碍,伊斯兰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伊斯兰是可以替代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①

^① 马克西姆·洛丁森(Rodinson, Maxime):《伊斯兰与资本主义》,奥斯丁: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 1978 年版。彼得·格兰(Gran, Peter):《资本主义的伊斯兰根基:埃及,1760-1840》,奥斯丁: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认为伊斯兰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观点,通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穆斯林社会没有经历工业革命?对此最直接的解释就是:穆斯林由于不能及时把握现代科技的发展,而错过了工业革命的时机。而穆斯林未能做到这一点的原因,通常又归结为伊斯兰世界未能有效地分享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成果。^① 亚洲和非西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对这种观点很熟悉,因为同样的反事实的论断也被用于解释中国人、印度人、非洲人、拉美人和其他许多非白人民族所谓落后的原因。这种以民族为中心的论断低估了欧洲人在其殖民地获取的财富和发展,以及他们占领殖民地之后带来的破坏。在非西方社会形成的新兴经济体正在稳步缩小自身与西欧和北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当前在不同文明之间的财富与权力的再平衡,使得人们越来越难以想象,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取决于某些心理习惯和美德,而这些心理习惯和美德竟然会更容易在纽约和柏林,而不是在伊斯坦布尔和上海得到充分的发展。

至于将伊斯兰视作可以替代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的观点,在伊斯兰经济学的某些理论中,这个观点看起来似乎是有道理的,即便如此,伊斯兰银行和投资基金的实践也使这一观点越来越站不住脚。伊斯兰金融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主流之下的一个分支,而不是可以替代资本主义的竞争者。^②

在任何一个国家,伊斯兰金融机构都必须接受该国政府中央银行的规则和监管。而各国中央银行也必须遵循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员会的指导,该委员会是所谓的银行家俱乐部,在资本充足率、风险管理、会计惯例和交易流程等方面制定世界通行的标准。伊斯兰金融产业可以针对管制政策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偏好,但在遵从国际规则这个方面,则别无选择,而且伊斯兰金融产业的领导层也迫切希望表现出自己恪守国际规范的形象。

伊斯兰金融机构由于被剥夺了对规则的制定加以控制的权力,因而借助于销售和公关的能力来寻求发展,在这方面它们常有创新,不时获得成功,但也会遭遇尴尬,陷入丑闻。伊斯兰银行家试图模仿常规的投资、贷款、租赁、储蓄账户和保险单,向客户提供类似的产品与服务,但在穆斯林市场,它们最突出的特征,同时也是最具竞争力之处,就是它们确保自己的实践能够遵循伊斯兰法律的原则,就像这个行业的行话所说的那样,它们是“遵从伊斯兰教法”的。

对于伊斯兰教法到底允许什么,或者谁有权威作出此类的判断,其实并没有共识。尽管对于最好的惯例和本土的商业习惯,偶尔会有一致认识,但共识是没有的。所有的伊斯兰金融机构都设有一个伊斯兰教法咨询委员会,对契约

① 布莱恩·S·特纳(Turner, Bryan S.):《马克思与东方主义的终结》,伦敦:George Allen & Unwin,(1978)。帖木儿·库兰(Kuran, Timur):《伊斯兰主义的经济困境》,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罗伯特·R·比安奇:“伊斯兰金融革命”,《芝加哥国际法研究》,7:569,(2007)。

和行动的适当性展开评估,但许多这样的委员会都充满了利益上的冲突,它们各自的观点也由于所在国家和机构的不同而迥然相异。许多伊斯兰投资机构都设在普通的欧洲银行内部,在这样的机构里,非穆斯林高管公开争夺商业与消费金融市场上的穆斯林客户。

一个关于伊斯兰金融的聪明的批评者,将这样的生意贴切地描述成“伊斯兰教法套利”。这样的生意将通常的银行与投资项目重新打包,并贴上新的标签,这样一来,尽管潜在的客户无法获取足够的信息来准确评估这些生意所作的宣传背后的真实的安全性与宗教来源,只要潜在的客户里有些人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或对于文化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就会被吸引住。^①事实上,当该产业正在试图发现属于自己的市场,并需要逐渐了解各地对精神与经济风险的容忍度的差异时,这样的套利是相当妥当的。包含宗教动机的经济决定,总是需要以一种很私密和不确定的方式,在道德的考虑与物质的考虑这两方面之间取得平衡。并不存在预先设置好的细分市场的方法;在人们的品味与道德意识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每一家机构和每一种产品都要接受不断的试错。

幸运的是,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促使一些占主导地位的伊斯兰金融中心激发出相当程度的灵活性和开放性。我们可以看到,在伊斯兰银行家与来自东南亚、波斯湾、欧洲与北美的多种多样的文化环境的投资者之间,热烈的讨论和活跃的借贷活动越来越多。科伦坡、迪拜和伦敦已经习惯采用彼此的方案与项目,而不是借助互不兼容的规则以及对规则的解释来试图划出排他性的地盘。

现在伊斯兰金融市场的核心,已从过去一小批试图将石油美元投入流通的阿拉伯亿万富翁和政府,转变为正在崛起的一大批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客户,这些客户寻求按揭贷款、教育贷款、小企业贷款、人寿保险、退休养老计划以及可以免税的举家前往麦加朝觐的储蓄账户。这些小客户希望能够对冲自己的风险,将自己的储蓄和投资分成几块,分别放在国内外的伊斯兰金融机构和常规金融机构。与过去相比,他们在更多的时候由自己决定,如何在伊斯兰传统和谨慎可行的现实运作之间实现平衡,而对传统宗教权威与既定教条考虑得较少。

伊斯兰金融变得越来越遵循国际经济规则,越来越理解一般市民的偏好,越来越能够灵活地调整自身以适应各种混杂的和多元化的文化环境。现在,伊斯兰金融一方面不断向外拓展,变得愈加国际化,另一方面则对内不断深化,愈加植根于社会大众。由于既遵循全球规则,又尊重消费者的选择,伊斯兰金融看起来正处在良好的位置上,因而能够从伊斯兰全球化的另一个领域得益,这

① 穆罕默德·A·艾尔-伽马儿(El-Gamal, Mahmoud A.):《相互性作为矫治伊斯兰金融中的寻租性的伊斯兰教法套利活动的一种手段》,载《雷鸟国际商业评论》,49: 187, (2007)。

个领域就是现在不断增长的要求政治生活和宗教思想民主化的需求。（当然伊斯兰金融也许同时也在积极支持这个领域。）

三、民主与伊斯兰现代主义

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民主正在得到广泛的实践和高度的珍视。军国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力量尽管试图摧毁人们对民主的追求,却无意间在更长的时期内使追求民主的力量重新振作。我们可以看到,相似的戏剧在一个接一个的国家相继上演。军事统治者上台又下台,一部部宪法被撕毁后又重新拟就,各种政党被禁止后又重组并贴上新的标签。而与此同时,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一直存在,随风而倒,却又不断地加深自己的根基,一直到下一轮选举为社会网络和联盟建设的更新打开新的道路为止。

为何在穆斯林当中民主显得如此坚韧而顽强?我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穆斯林社会长期以来在托克维尔所说的“结社的艺术”的领域有深厚的积累,这是指各种类型的集体行动,这些集体行动允许人们通过合作来克服他们原本完全不能掌控的问题。^①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是社团生活最发达的地方,但我对社团生活的活力与多样性的最初体验,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土耳其的市镇与村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作为和平队的志愿者曾在这些市镇与村庄生活和工作过。那时,无论我旅行到什么地方,总能看到周围环绕着很多社会团体的办公室和总部,其数量与多样性令我惊叹。他们代表着每一个社会阶级和数不清的社团活动,这些社团活动涉及的范围,从宗教和福利到民俗和体育,可谓无所不包。实际上,我的所有同事和邻居,都兼任几个社团的成员且积极参加活动。这些人并不是有大量充裕时间可以支配的大城市居民或富人,他们只是一些农民、店主、公务员、挣工资的人、学生和家政服务员,他们都要养家糊口,或耕田种地。当时每次我去参观某一省的首府,都会发现一些不同的总部和会所,而在竞选期间,大批选民就会涌入这些地方,围住所有政党的候选人的演讲台。

一旦我把握住了这些社团组织的重要性,我就意识到了对它们进行深度研究的必要性。最终我回到土耳其开展了一年的实地调查,这一年的调查为我撰写关于利益集团政治的第一本书奠定了基础。^②

我在去土耳其生活之前的阅读与学习经历给予我的政治经验和独立思考能力,达不到我在土耳其各地遇到的普通民众的政治经验与独立思考的水准。实际上,美国的大学教给我们的常规经验是,由于土耳其有奥斯曼帝国的遗产

① 艾利克谢·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纽约:Vintage Books,(1954)。

② 罗伯特·R.比安奇:《土耳其的利益集团与政治发展》,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和伊斯兰的习俗,因而必然存在着威权主义的各种倾向,所以土耳其的民主必然会遭遇重创。但我逐渐确信,情况可能正好相反,土耳其的历史与宗教背景在很多方面为他们的现代文化与制度带来了丰富的养分,能够推动其经济的发展,并推进民主的价值理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埃及生活的时候,我目睹了由“结社的艺术”推动的大众权力的一场更为宏大的展示。在安瓦尔·萨达特被刺杀前的一年间,他开始攻击每一个敢于批评他及其执政党的独立社团。他几乎每周都会逮捕工会领袖、记者、教授、法官或布道者。没有哪个法律类别的社团或社会部门能够逃脱他的围捕:志愿组织、工商社团、职业辛迪加、工会、农民合作社、教堂和清真寺,都在劫难逃。^①

胡斯尼·穆巴拉克上台之初,紧张形势暂时有所缓解,因为没人知道他将如何行事。在穆巴拉克上台初始的一两年里,许多派别竞相争取他,拉拢他,认为可以利用他缺少经验且明显孤立的状态,达到自己的目的。但穆巴拉克显得更加自信,坚持要将政党、军事和工商事务全部同时置于自己的亲自掌控之下。于是宗教极端主义者拿起了武器,这反而使穆巴拉克找到了一个方便的借口,通过实际上永久有效的紧急状态法支撑起一个警察国家,进一步强化了对权力的掌控。

与萨达特执政的最后一年的动荡形势相比,穆巴拉克统治下的埃及公共生活死气沉沉。那些潜在的反对者渐渐退隐,坐等这个健康状况不佳的独裁者最终退休,直到他决定任命自己的儿子为接班人,企图建立起一个家族王朝,情况才有所变化。这种打算建立家族王朝的企图,激起了广泛的愤怒和大众的抵抗,其规模之巨大甚至超过了萨达特所引发的社会运动的规模。当埃及人看到突尼斯革命的胜利时,群众变得无所畏惧而势不可挡,大规模的动荡先是出现在开罗,随后出现在亚历山大,最后横扫整个国家。

我的许多在中东研究圈内的同事,对“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并不感到高兴。他们很多人不仅完全没有预料到“阿拉伯之春”种种事件的发生,而且在此前就已排除了在这一地区的多数地方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很多人宣称,这些反叛是无法预料的,或者是随机性事件,就如同超越所有经验和机制的“黑天鹅”那样。^②

但事实上,经历过萨达特统治时期最后一年的人们,没有人能够找到理由

① 罗伯特·R.比安奇:《桀骜难驯的社团主义:20世纪埃及的社团生活》,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Taleb, Nassim Nicholas):《黑天鹅:高度不可能事件的影响》,纽约:Random House,(2010)。扎合尔·雅荷亚(Yahya, Zaher):《阿拉伯之春是中东的黑天鹅运动》,载《赫芬顿邮报》2010年6月12日。

来判定,暴政能保持稳定,或者革命永不可能从暴政中产生。任何人只要目睹了埃及社交网络及其成员左右逢源的能力,就能充分理解其对付独裁者并最终推翻他们的能力。

穆巴拉克垮台后,穆斯林兄弟会就成为埃及最强大的独立社会运动,成为最有能力填补权力真空的社会组织。对于旧的威权主义政权的支持者来说,穆斯林兄弟会正是由于这一特征,因而显得非常危险。革命之后最初两年的选举与全民公决中,穆斯林兄弟会的候选人及其提出的倡议,每次总能获胜。穆斯林兄弟会因此成为唯一能够在城乡各界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选民中获得支持的社会运动,其地位日益凸显。^①

这种权力的失衡越来越被认为是阻挠政府为巩固民主所作的努力的一项障碍。穆巴拉克的密友逐渐鼓励军官和失意的政治家们与他们一起,将穆斯林兄弟会描述成一个正在形成之中的宗教独裁组织,而这恰恰与穆斯林兄弟会对自己的宣传定位相反,穆斯林兄弟会宣称自己是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对手运用上述策略,发动了一场反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行动,意在彻底根除这一组织,而不仅仅是宣布其在选举中获取的胜利无效。但穆斯林兄弟会仅仅只是跨国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一个分支,对其施加的压制,对埃及类似的社团和埃及以外的社团没有太大影响。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伊斯兰现代主义是一场推行宗教与社会改革的大众运动,旨在促使每一个穆斯林社会实现宗教知识的民主化。^② 在世界的每个地方,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已成为主流世界的行为体,塑造着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经济、政治与学术生活。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鼓励普世教育,使一般公民能够自己思考问题,而不是依赖宗教权威。他们的先驱,包括宗教的门外汉和宗教改革者,如“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印尼的艾哈迈德·德哈兰,印度的穆罕默德·伊克巴尔,伊朗的阿里·沙里阿提”,等等,还有其他很多人,这些人都是全国性的先驱与领袖,他们开创性地探索将科学与宗教融合在学校教育体系之中的方法,使之成为孵化器,培养出成为当今中产阶级主力的男性与女性,这些男性与女性现已成为杰出的专业人士、企业家和利益集团领袖。^③

伊斯兰现代主义者们建立的政党与社团,与许多其他派别共享政治权力,

① 罗伯特·R.比安奇:《对民主的城市反弹:对多数的暴政的斗争还是乡村权力的崛起?》,Égypte Monde Arabe, 11: 67 (2014)。

② 法兹勒·拉赫曼(Rahman, Fazlur):《伊斯兰与现代性:一项知识界的传统的转变》,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③ 查尔斯·科兹曼(Kurzman, Charles)编:《自由伊斯兰:一部原始资料集》,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从而建立起联合政府、议会反对派和公民社会网络。^① 不论是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还是在穆斯林人口占少数的国家,他们都为捍卫和拓展民主、人权、妇女权益和法制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日益超越那些传统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派别,虽然后者在很多媒体中,尤其是在西方媒体中,常常占据头条的位置。即使在他们不直接施加治理的时候,他们通常也会在伊斯兰世界的主要国家里,引导和约束关于内外政策的讨论。

伊斯兰现代主义有多种多样的形式,致力于通过强有力的方式将私营工商业、社团多元主义、宗教改革和民主结合起来。穆斯林越来越多地加入到了当代生活的跨国主流之中,而伊斯兰现代主义者既是这一趋势的领导性的中介力量,又是其最大的受益者,他们可谓伊斯兰全球化的主要支柱。

四、外交与大国政治

在国际关系中,伊斯兰国家常常完全融入全球社会的规则与事务的体系之中,并不存在分离的单独的伊斯兰国际体系,也没有人致力于另起炉灶,建立一个这样的体系,与联合国的框架开展竞争。伊斯兰国家的主要国际组织,“伊斯兰合作组织”(OIC),明确表示承认和接受联合国的权威,服从其有约束力的决定。“伊斯兰合作组织”已经多次拒绝有人提出的建立一个伊斯兰版的国际法庭(亦称为世界法庭)的设想,因为该组织并不想表现出挑战联合国崇高地位的咄咄逼人的态势,也不想鼓励那些为国际争端寻求国际法裁决的伊斯兰国家到处选择法院进行诉讼。

在处理国家间政治的过程中,穆斯林采用国际社会每一个成员都采用的同样的外交规则、多边国际组织原则和国际法,并对此作出贡献。在 5 个世纪的时间里,奥斯曼帝国不仅是欧洲国际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成员,而且也是在三大洲同时开展均势政治的技艺娴熟的老手。^②

几乎所有的穆斯林国家都遭受了欧洲殖民者某种形式的殖民与征服活动的攻击。就像多数其他非西方民族那样,他们后来表示愿意接受欧洲和北美在二战以后构筑的国际规则与机制,以此作为交换,重新获得了独立。近年来,穆斯林外交家们已经与来自亚洲、非洲和拉美的同行们联合起来,向国际社会施压,寻求建立一个具有更大包容性和更平等的国际秩序。他们已经与金砖国家和一些 G20 成员联合起来,共同为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改革所涉及的范围广泛的问题出谋划策。

① 列昂那多·宾得(Binder, Leonard):《伊斯兰自由主义:对发展意识形态的批判》,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② J.C. 忽维茨(Hurewitz, J.C.):《奥斯曼外交和欧洲国家体系》,载《中东研究》,15: 141,(1961)。

就像中国那样,伊斯兰世界的多数国家既希望能保留并强化现存的全球秩序,又希望拓展这一国际秩序的领导作用,使其超越西方大国占据支配地位的传统架构。由于国际社会主张改革现存全球秩序的联盟逐渐获取了更多的力量,有人越来越担心北美和欧洲国家可能从全球治理的架构中逐步撤出,甚至借助排他性的安全与贸易的制度安排,构筑起地区性架构的壳,进而缩入这些壳里。

从这一视角来看,很重要的一点是,穆斯林外交家们已经避免了,并有希望在未来继续避免,为穆斯林世界构筑起这样的制度架构的壳。对哈吉和伊斯兰金融实施管理的新的国际机制是富有希望的实验。管理上述两项事务的两项国际机制,都是为了适应在许多不同的文化体系里生活的穆斯林的特定需求和敏感性,经过因地制宜的逐渐调整才得以形成的,但这两项国际机制采用了能够引导世界每一个地方的全球治理的同样的结构和最好的惯例。通过这种方式,伊斯兰全球化即使致力于为特定的品味和传统的习俗提供服务,也依然能够获得一个现代和普世的身份。

五、中国与伊斯兰全球化

中国的命运与伊斯兰世纪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他们彼此间的相互依存正在日益深化。中国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战略,包括“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恰好穿插经过亚洲和非洲的很多伊斯兰国家。中国的一些作家甚至将这两条路线称作“穆斯林走廊”,因为这两条路线将中国自己的数百万穆斯林公民与伊斯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市场与文化连接了起来。^①事实上,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两者正在逐渐成为一个包容整个非洲和欧亚大陆的跨越大洲和海洋的超级区域枢纽。

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正在探索当前形势的新发展对中国对外关系和国内发展的重要意义。已经习惯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概念的读者,现在正在逐渐认知“地缘宗教”的概念及其对加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意义。^②中国的穆斯林和他们的历史遗产正越来越多地被视作天然的资源,而不是从外部输入的或边缘性的集聚群体。现在中国穆斯林正越来越多地被视作是一项伟大的世界性宗教的追随者,而这项世界性宗教包涵着价值量很高的知识和纽带,有助于中国在全球获取新的位置。^③“中国伊斯兰”被视作是一项独特的创新,

① 邹磊:《新丝绸之路宗教与贸易的互动:以义乌、宁夏为例》,载《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1期,第32页。

② 徐以骅、邹磊:《地缘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第26页。

③ 徐以骅:《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宗教》,载《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第69页。

与中国形态的佛教、儒教和基督教相似,能够促使中国与普世的伦理体系展开交流,既共享彼此的精华,又能对普世的伦理体系作出自身独特的贡献。^①

现在,世界上有许多地方的人们感到担忧,害怕中国正在崛起的力量可能会搅乱国际秩序,在这样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对软权力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热切地认同关于文明间的交流和全球治理的一些远见卓识。伊斯兰全球化体现了一种由经济、社会与外交的发展变化互相交融而形成的结合体,它允许现代穆斯林加入国际社会生活的主流,并同时对社会加以改革。其实,这些也正是中国的目标,中国也希望避免因超级大国的对抗而引起的大博弈,并希望通过和平的竞争在世界事务中获取更多的影响力和敬意。

^① 伊丽莎白·阿莱斯(Allès, Élisabeth)、雷拉·谢里夫-谢比(Leila Chérif-Chebbi)、康斯坦斯-海伦那·海丰(Constance-Hélène Halfon):《中国伊斯兰:一体化与碎片化》,《宗教、国家与社会》,31:7,(2003)。

Islamic Globalization and Its Role in China's Future

Robert R. BIANCHI

(Robert R. Bianchi, ph. D, Political Scientist and
International Lawy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Abstract Islamic Globalization is a combination of religious, economic,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advances that are transforming the Muslim world. Its building blocks are the hajj and religious travel, capitalism and Islamic finance, democracy and Islamic Modernism, as well as new international regimes tailored to the varied needs and tastes of Muslims in diverse cultures. Islamic Globalization allows modern Muslims to join the mainstream of international life and to reform it at the same time. These are also China's goals, particularly as Chinese leaders express greater interest in soft power; eager to identify with visions of civilizational exchange and global governance.

Key Words Islamic Globalization; Islamic Finance; Islamic Modernism

(责任编辑: 杨 阳)